

無論在甚麼領域，改革遭遇困境，總可歸結為制度或者文化因素。傳統文化的影響固然值得重視，但是現行制度長期運作所造就的規範內化，也就是左右着人們行為的規則與價值觀，更值得我們仔細加以研究。這或許是一個尚未得到很好耕耘的學術田野。

——編者

思想史研究的現實關懷

袁偉時是具有現實關懷的思想史家。拜讀其大作〈近代經濟民族主義的是非功過〉（《二十一世紀》2007年4月號）後，更加深了我的這個印象。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意識的反彈，為多方因素所促成。如果說民族主義本身含有自然而然的情感，民族主義的反彈就有其合理性。問題在於，民族主義不僅是情感，它關涉到社會政治的多個方面。在當代中國民族主義情感之下潛藏的排外情緒，以及非此即彼的一元論，令有關民族主義的討論變得複雜化。

事實上，袁先生並不反對單純的民族主義。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可以說是各種思潮的重要背景或支撐，其「雙刃劍」的特點表現得非常明顯。袁先生所以證之以近代中國的經濟狀況，並且詳細列舉數據，主要還是反對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其重要表現，即是將國家發展的障礙完全歸結為外來（西方）因素干擾的傾向。

文中雖然主要討論近代中國的經濟民族主義問題，但它所揭示的實際上是普適原則與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三邊互動

民族主義的內在衝突，以及解決這種衝突所應取的姿態。

普適原則不僅是自由、民主，也包括市場經濟、國際貿易準則，甚至怎麼處理國家與公民、國家與社會、政府與經濟的關係的原則也包含其中。但在民族主義的背景，這幾乎是常識性的東西卻由於政治因素、心理因素的作用而被模糊化，以致出現政治原由的偏差和有意或無意的自大。袁先生防止「民族主義自大和自戀症」的提醒，自然容易讓人想到胡適的類似說法。胡適希望中國人多多反省，因為只有具備了反省的精神和勇氣，中華民族才會真正地自信。

尤小立 蘇州

2007.4.28

儒家文化：專制下的生存之道

陳志武的〈儒家文化與中國金融發展的滯後〉（《二十一世紀》2007年4月號）一文讀後，讓筆者深受啟發。但筆者更傾向相信的是，儒家文化是數千年來中國人在專制與集權下的生存之道。

儒家在中國歷史上脫穎而出，是因為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各有所需。對於皇帝，統治隊

伍中的精英不可能說要限制王權，他們只能對皇帝說「仁者愛仁」，用仁愛統治天下。這樣官僚們可以減少「伴君如伴虎」的危險，又可以降低人民對暴政的反抗。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統治經驗的總結。

對於人民，儒家則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父子各守其道，強調的是作臣子要遵守、不要挑戰既定的秩序，以免招來「滿門抄斬」的災難。實際上，這就是說儒家文化成了在專制與集權情況下普通民眾的生存之道。這恐怕也是儒家文化在中國得以普遍認同，並在數千年裏得以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吧！

因此，歷史地看，儒家文化在中國是有積極意義的；從現實看，儒家文化的復興是因為當今仍存在類似的土壤。但對解決中國現實問題，儒家文化能夠發揮的作用甚微。

儲昭根 杭州

2007.4.30

制度與集合主體的雙重缺失

徐昕在〈中國農民工為何以死抗爭？〉（《二十一世紀》2007年4月號）一文中指出農民工為權利而自殺的行為是理性

與激情的混合型結果，是一個符合經濟邏輯的理性選擇，這個判斷應該是符合今日中國農民工問題的現狀的，也為解決農民工權益維護問題提供了路徑。當然，實際的問題還更複雜一些，其中更突出的問題，是這些紛繁的表象下的制度與集合主體的雙重缺失。

制度和政策的背景就是，加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需要工作紀律和效率，而在此前的國營企業中，因為大鍋飯體制而使工人不可能自願地投放工作能量，因而不會自動實現高效率。農民因為天生的一些因素，對現代化作業可能不適應，至少習慣上是排斥的。要讓農民工適應現代化要求，似乎不得不給予一定的壓制，以使得他們能夠接受提供給他們的工作條件和工作紀律。在加速現代化的宏大目標下，企業和企業家更需要支持，以使企業能夠加速運轉。

企業家在這裏是現代化的發動機，而農民工和城市一般工人只有在發動機的轉動下才能快速轉動起來。這就決定了在憲法和法律上排除了西方式的罷工等維權和博弈行為；也不允許他們通過建立自主的組織來維護自己的權益。農民工沒有比較快速、低成本的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益。中國的工會在目前情況下，要維護普遍的農民工權益還力有不逮，何況，許多農民工還沒有工會會員的身份。

在已經取得現代化效率、農民工和城市工人已經適應現代化企業紀律和效率要求，並且出現相反的權益受損加劇的情況下，基於建設和諧社會的考慮，這兩大缺失需要努力加以彌補。如徐文所言，目前的

公權力和一些相應的機制由於程序複雜、時間長、成本高而效率低，因此需要新的制度和新的力量來彌補。就制度設計而言，雖然在今日中國還不能採用西方的模式，但對於勞資糾紛應該建立一些有效的審裁制度。特別是對農民工影響比較大的問題，如拖欠工資、工作條件惡劣、身體損害等問題，是完全可以建立比較嚴格的制度的。這就需要一個公民社會下的諸多非政府組織發揮其作用。新聞媒體也需要在這個方面發揮更實質性的作用。

丁松泉 杭州
2007.5.4

中國改革的政治動力學

當下中國改革與轉軌實踐正在駛入前所未有的「深水」階段，遭遇着愈來愈多的體制性約束。易憲容〈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制度分析〉（《二十一世紀》2007年4月號）一文對當前的中國金融改革作了深刻的總結。

說到底，當下中國金融改革的困境可以歸結到政治治理結構當中的基本問題，一種「雙軌制」的改革形態導致國有商業銀行「亦商亦官」的事實存在：「亦商」可以分享市場經濟帶來的好處，「亦官」可以延續計劃經濟所帶來的好處。行政上的官僚身份也促使國有金融機構加強話語權的把持和決策權的穩固。如果國有銀行改革仍然由一個龐大的金融官僚集團推動、主導和設計，那麼交互的人事鏈和盤根錯節的關係網就會掌握了金融領域內幾乎所有的權力資源，他們引領着

政府金融政策，分享着金融改革的紅利，他們中的一些人更擅長政治技巧，而不是市場思維和管理技術。最後的結果是，國有銀行的壟斷性及對社會金融資源的聚集性不斷在強化，在收益不斷市場化的同時，成本卻在社會化或政府化——政府或社會承擔着不該承擔的改革成本。自利性與公共性之間的尷尬博弈加劇了金融改革中的道德失衡。由此可見，金融改革的政治動力學需求已經愈來愈顯明。

實際上，中國改革的核心問題涉及到「誰在改革，為誰改革，如何改革」等一些基本問題。一些「傾斜」或者「失衡」了的問題都需要從制度層面加以深層次地解決。

陳潭 長沙
2007.5.4

更正

《二十一世紀》雜誌編輯先生：

我的書評〈不可多得的紅衛兵史料——《紅衛兵興衰錄》〉（發表於貴刊《二十一世紀》2007年2月號）有一處人名錯誤，需要更正。文章提到宋柏林1966年8月18日，「與卜大華、駱小海三人作為清華附中紅衛兵代表，在天安門城樓上面見毛澤東並簡短交談。」其中卜大華應當是韓軍。《紅衛兵興衰錄》編者余汝信先生向我指出了這一錯誤。我就此更正，深表歉意，並感謝余汝信先生的指正。

印紅標
2007.3.30